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

(第一辑)

话说云冈石窟

主 编 李元庆 副主编 马志超

赵一德 著



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。在云冈石窟，你可以一睹世界级的雕刻艺术；可以领略佛教的庄严法像和震撼心灵的佛影梵形；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去凭吊那个逝去的北魏王朝；更可以去追寻那个“来无踪去无影”的鲜卑民族；看罢石窟，还可以引发你去体味石头佛陀的魅力，给你留下几许疑窦和几多萦怀。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一辑)

- 1 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
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
- 2 佛教圣地五台山
- 3 话说云冈石窟
- 4 洪洞大槐树寻根
- 5 山西书院史话
- 6 三晋戏曲漫话
- 7 北魏政治女杰冯太后
- 8 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
- 9 朱总司令在太行
- 10 高君宇的革命生涯

话说云岗石窟

赵一德 著

*

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.375 字数:27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*

ISBN 7-80598-340-2
K·108 定价:2.50 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
姚奠中 侯伍杰

主任委员：赵雨亭

副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总 主 编：李玉明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王宝库	牛崇辉
任茂棠	刘 江	刘在文	刘纬毅
刘贯文	成葆德	李 鹏	李元庆
陈扬炯	陈墨章	张 颌	张国祥
张捷夫	罗广德	赵瑞民	赵曙光
高专诚	高建民	高培湖	陶正刚
柴泽俊	阎广洪	曹福成	梁豫秦
谢洪涛	楚 刃	雷忠勤	

目 录

引子	(1)
一、何来“西来第一山”	(6)
二、谁使佛教遭“法难”	(11)
三、现“黑石”皇帝成佛	(14)
四、开“五窟”昙曜造像	(17)
五、花开现佛“犍陀罗”	(25)
六、“马上鼓吹”登佛堂	(29)
七、释迦、多宝，两重天	(33)
八、寒泉、石鼓、千岁情	(37)
后话	(40)

引 子

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石窟洞天，何故实相？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佛影梵形，是谁真身？

朋友，你参观过云冈石窟吗？

你若有机会涉足山西，切莫错过到山西北部历史文化名城大同走走，去参观一下驰名世界的云冈石窟。

你在云冈石窟：可以一睹世界级的雕刻艺术；可以领略佛教的庄严法像和震慑心灵的佛影梵形；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去凭吊那个逝去的北魏王朝；更可以去追寻那个“来无踪去无影”的鲜卑民族；看罢石窟，还可以引发你去体味石头佛陀的魅力，给你留下几许疑窦和几多萦怀。够你回味好几天的。

这些，确实饶有趣味。

第一，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它和印度的阿旃陀石窟、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有等同的价值，其艺术水平又可以和“犍陀罗艺术”相媲美；在中国又与敦煌莫高窟、龙门石窟，并列为“三大石窟”，而且又以其“云冈风格”独树一帜。

第二，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块里程碑。它是北魏王朝以皇家的力量开创的一处佛教胜地，不仅窟大、佛大、气派大，而且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第三，云冈石窟记载和反映了北魏的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。它集中凿琢于北魏一朝，其中蕴含了北魏的幕后政治、宫闱内秘、社会风气等等，有正史难以书写的隐私，而被蕴藏在佛影梵形的背后。故而它又是“北魏的历史博物馆”。

第四，把鲜卑民族的民族心态、精神向往、审美观念、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，详尽地记录下来。所以又是一部“鲜卑民族字典”。

第五，北魏时代的民情风俗，已是难觅的资料，云冈石窟却透过民间工匠之手记录下许多珍贵的写实形象，仿佛能把人带回到北魏当年的那个社会环境中去。那么，它又是一部“北魏风俗通”。

你看，它的内容何等丰富！

一旦把它看活了，想活了，热闹得很呢！

这些成就又是由它的客观社会因素所决定的，具体表现在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上。

说它的历史背景，那是中国在 1600 年前，在东晋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中拓跋鲜卑崛起壮大，然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，时间达 200 余年之久。

他们立国后前期首都就在今天的大同，当时称平城。他们以平城作为政治、文化等中心，有近百年的历史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，自然要受当时诸多社会形态的影响，诸如：宗教信仰、文化交融、民族意识等等，甚至连太后摄政的尴尬、半壁江山的困惑等也要属入。故而它的内容相当丰富。

说它的地理条件，可就有点事出偶然。

佛教徒们开凿石窟总是要选择山光水色、神灵秀气、环境幽雅、景色宜人的好地方，故而“天下名山僧居半”。可是云冈石窟所在的“武周山”（又称武州山），既不是什么名山，风光也谈不上秀丽；它山势平平，更无崇山峻岭、深沟险壑；它的水也属平常，山脚下的那条武州川，毕竟是一条季节河，时旺时浅，不足构成浩淼的景观。这种自然地理景观，本不适于开窟造像，而那位著名的昙曜和尚却偏偏选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原来这里的人文地理条件远远胜过自然地理条件，那就是武州山早已是神山、灵山了。

是谁赋予武州山这份神灵之山的人文景观的呢？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那位被研究云冈石窟者们冷落了的法果和尚。他在北魏定都平城那年（398年）就当上了第一任“道人统”，就在当年奉命建成佛教的三大建筑，即所谓的“五级浮屠、耆阇崛山、须弥山殿”。这三大建筑就在今天的云冈第3窟，在其内外上下几乎都可觅到其遗踪。于是一下子这个不起眼的武州山就成了神山、灵山，而且久盛不衰。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数次来这里祈祷神灵，昙曜在62年后选这里开窟造像，根源在此。

如此说来，开凿云冈石窟第一人，第一斧，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昙曜和尚，而应该是法果和尚；也不是“和平初”（460年）才开凿，而是《南齐书》记载的那个“天瑞年”（即天兴元年、398年）即已开窟。那么云冈石窟今年整整是1600（398—1998年）岁了。

云冈石窟的名称，是在明朝中叶才出现的，北魏当年称

之为“武州山灵岩石窟寺”，而且长期延续下来。这个武州山位于平城之西，距平城 15 公里许。其自然地貌实为一段冈崖，可分东段、中段、西段三个区域，由自然断沟分割而成，总长约 1 公里许。东段可能是天然溶洞结构区，法果为尽快地建成“耆闍崛山”（洞），巧妙地利用了第 3 窟那个大溶洞，开创了武州山的人文景观，也就赋予了武州山的神灵地位。这不能不说是武州山的一次偶然机遇。待昙曜再兴凿窟造像以后，武州山挤入名山之列，还可以说是个偶然。

当年的“武州山灵岩石窟寺”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说：“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。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。林渊锦镜，缀目新眺。”它的规模多大呢？道宣和尚在《大唐内典录》和《昙曜传》中都说：“东西 15 公里，栉比相连。”好大的范围！这也并非夸大其辞，现代考古家们已经沿着武州川水西上，在川水两岸，找到了吴官屯石窟、鲁班窑石窟，至焦山石窟等，连成一线。焦山距云冈正是 15 公里。道宣也是言之有据的。只不过岁月的风霜使这些民间凿琢的小石窟残泐凋零，断了连线，而失去了当年的规模。

现在你能看到的云冈这段，乃是皇家工程的精华所在。此处山崖的地质构造是水沉砂岩，易雕刻，由此而一改西域、河西石窟那种以泥塑、彩绘造像的手法，而开创石刻佛、石刻一切装饰“全石化”的石窟文化。这一点又当归功于自然地理的条件。

云冈这段现存洞窟 53 个。这是按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本世纪初为云冈石窟编号而定的。该编号是自东头起为第

1窟，次第跨越中部、西部至西端小窟群到第53窟。这个编号有一定的历史性、科学性，故至今沿用。这段中尚存佛像约51000余身（不完全统计），大像高达17米多，小像才有几厘米。造像以佛像、菩萨像为主，还有弟子、供养人、飞天、殿堂、塔、鸟兽、花木、法器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这么多的佛、菩萨，是不是释迦牟尼、观世音等？也是！也不是！原本印度佛教主张“佛本无相（像）”，有像是后来希腊的造型文化浸润进去的。说它“是”，是因为北魏时“像”已经是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，即所谓的“像教”；说它“不是”是当年那个法果和尚早喊出了“皇帝即当今如来”的口号，把现实的佛落到了皇帝的身上。那么昙曜在这里造像到底是为谁而造的呢？他心中有数，别人却难以捉摸。真得仔细想想！不妨从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去想想。

可是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云冈石窟的窟和像，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当你进入其中，真有置身于佛国之感，好像是一下子从天外飞来那么多的佛和他们的“眷属”，让你眼花缭乱，深感不可思议，这时恐怕你只好用佛教的“色”（物质、具象）与“空”（理念、抽象）观念去解释了，且别管它数清数不清佛像的第6窟也罢，还是只有三身造像的大空窟第3窟也罢，“色即是空”，“空即是色”，一回事。

但是人们毕竟要问，这样浩瀚的凿琢，是怎么刻出来的？有位诗人说，“此山端得五丁开”（五丁是中国神话中的大力士）；文人说，“鬼斧神工”；老百姓说，“一声巨响塌下半边山露出来的”。谁也不说是人工开凿的，正反映它太不可思议了。好在近百年来，各学科的专家们作了不少研究，逐

步理出个头绪来，所以这里还能说出个子午卯酉。

一、何来“西来第一山”

山不在高，有窟则灵；

窟不在像，空洞更神。

今天，当你步入云冈石窟山门时，既看不到山，也看不到窟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派巍峨重叠的楼阁建筑。你或许会怀疑误入某个寺院走错地方！没走错。石窟、山崖都包裹在这些楼阁后面。若在北魏当年来这里，你会看到全是这种样子，十个大寺庙把这里第1至第20窟包得严严实实，比现在这几个楼阁壮观得多呢！现在你看到的是清朝初年改建的，也仅仅覆盖了四个窟：正对山门的四层楼后是第6窟；迤东的四层楼后是第5窟；西侧夸崖的三层楼是第7窟（近年重修）；再西是第8窟（楼已毁）；再西就全是裸露的石窟了。你还会为看不到酈道元笔下的“山堂水殿”而遗憾吗？

有些细心的朋友在浏览清建的楼阁之际曾发出慨叹：如此堂皇的建筑间竟无一匾一联以助文思，实在扫人雅兴。

不！清朝有过，而且颇为不俗。山门有匾曰“石佛古寺”；正对山门之第6窟楼前赫然悬挂的是康熙皇帝御书大匾曰“庄严法相”，配联曰“山色随云秀，佛灯供日长”；迤东之第5窟楼前则是总督佟养量书匾曰“大佛阁”，配联曰“顶天立地奇男子，炤古腾今大丈夫”；西侧之第7窟楼前特悬兵部尚书兼都御使马国柱的大匾曰“西来第一山”。三大人

物的三大匾，加上配联，清朝一代的人文景观也还说过得去。这种景观陪伴着清王朝直至其灭亡。民国初年尚能看到它，可惜今天已湮灭了，看不到了。

三大匾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那块“西来第一山”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

原来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第一山，乃是印度的灵鹫山，梵名就叫耆闍崛山。因为此山是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圣地，后被视为释迦的“报身净土”，神圣之极。马国柱把云冈石窟比作第一山，可谓独具慧眼。说它是“西来”乃是中国古代把印度纳入“西域”范围。由此而点明：云冈石窟就是从印度飞来的耆闍崛山。

可以说这是法果和尚在武州山建成耆闍崛山后遇到的第一位知音。法果等待这位知音，等了 1250 年。

马国柱，辽阳人，中过举人。顺治元年（1644 年），以汉军旗理事官的身份随清军入关，首任山西巡抚，又任第一届宣大总督，旋升兵部尚书兼都御使。是一位知识型的大官员。此匾则是在顺治四年（1647 年）他将离开大同时写下的，是他看懂了云冈石窟而写的。妙！（这时大同尚未遭到“屠城”之祸）

先到东部第 3 窟考察一下：

云冈第 3 窟是个非常奇特的洞窟。它的外部立面很复杂：底部是两个小洞，西小洞通入内洞，似为窟门；东小洞单体独立（近年底部与内洞挖通）。两小洞的顶部形成一个连体平台（宽约 8 米，长约 40 米），台上两侧有残塔遗迹两个（或即“五级浮图”），中间有一像龕，龕之两侧开两个明窗孔

为内窟照明窗。明窗之上高处有架梁孔 12 个，很大，呈长方形（约 3×1 米），内部还有樨槽。梁孔之上即是山顶，顶上曾有“石室数间”，抗战时日本人作过发掘，发现有殿堂两间，一南向，一东向（或即“须弥山殿”）。这种复杂的外部与云冈其他石窟不同。穿过西小洞进入内窟，内窟的窟形也非常不规则，它的平面呈凹字形，底边宽达 40 多米，两侧深达 15 米，中部凸出壁面宽达 30 多米，窟高近 20 米。如此巨大的洞窟却无造像，基本是个空窟。现在看到凸出的壁面西侧的三身大像，公认是后来补刻的（后面再叙说）。

这样的石窟，不仅在云冈仅此一例，在全国、以至全世界的石窟中也属罕见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专家们议论纷纭，可谁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因为他们都被那后刻的三身造像所吸引，却遗忘了法果和尚造耆闍崛山之举，所以越说越糊涂，真不如马国柱一句“西来第一山”切中要害。

这个耆闍崛山的故事，史书有记：

北魏初，开国皇帝道武帝，戎马倥偬，占领了北方不少地盘。皇始二年（397 年）进攻中山国（今河北定县），在赵郡（今河北赵县）交结上法果和尚。法果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，社会阅历甚深，懂得迎合皇帝，所以很谈得来。第二年就是天兴元年（398 年）（《南齐书》记这一年号为“天瑞”，中华书局本误校为“天赐”），道武帝迁都平城，下诏请法果赴京，并任命为第一任“道人统”主管宗教事务。又令在京城建筑佛教场所，安置僧徒。法果就在当年开建了：“五级佛图、耆闍崛山、须弥山殿”三大建筑和一系列的禅堂、讲堂等，气势不

凡。

对这三大建筑，平城考古者们也留意过，在城内毫无踪迹，成了一个谜；其实一旦跳出城去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按常规来说，五级佛图是“塔”，须弥山殿是“殿”，可以建在城内，而那个耆闍崛山呢？总不能在城里垒土叠石造一座佛山吧！是不是堆个山就成？恐怕还不那么简单！

东晋的法显和尚，唐朝的玄奘和尚，他们去印度目睹过耆闍崛山，据他们记载，该山的神圣之处并不在山，而是在“洞”即所谓之“窟”、“石室”云云。因为释迦及其弟子们一切重要活动如：禅定、讲法、经藏“结集”等都是在石室中进行的，所谓的“圣迹”也都在这些洞窟中。所以耆闍崛山实为洞窟的代称。这一下清楚了，法果的耆闍崛山也只能是个“洞”。是洞就不会建在城内。所以视线必须转到城外，何况史书上也点明过，说太宗明元帝时仍有“京邑四方建立图像”的活动，这就勿庸怀疑了。

平城郊外，何处最堪造窟呢？自然非武州山莫属。且看云冈第3窟：它的内窟怎么那么大大的、空空的，形状又是那么怪怪的？如果全由人工来开凿，这得取多少石头？那些废石又怎么运出去？（洞窟实况是没有大通道）工期得用多长时间？太不可思议了。可是从文献的口气看，似乎法果并没太费事，而且时间不长就建成了。这该如何解释？啊！有了。东头相隔不远的第2窟，有泉水在叮咚，它提醒人们这里有水。有水的山就可能会有自然溶洞，那么这个第3窟就该是利用了一个自然溶洞稍加整形凿琢而成者。

说云冈有天然溶洞也不是臆测判断。地质学家们早已

测定，这里在远古时期曾是“大同湖”区域。千万年的沧桑变换给几处山崖岩壁留下几个水溶岩洞，不足为奇。从武州山的湖沉积岩层和水沉砂岩结构，判断它处于“大同湖”的边沿地带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今云冈东部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，不仅第3窟是个大溶洞，第1、2、4窟也有显著的溶洞遗迹，否则第1窟哪来的“石鼓声”？第2窟“寒泉”何来？第4窟反而吊在半山腰？一言以蔽之，东部4窟皆为依自然溶洞取势，随形而凿琢罢了。

如此说来，法果选中了第3窟这个大溶洞，充分利用了它的自然条件，随形就势，没费太大的力气，就凿成一个大石室；又在窟外半山腰利用自然平台造了两个“五级佛图”（现存有三层石塔残迹）；再在山顶上盖出两堂“须弥山殿”。他的大功就告成了。云冈东部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从此，不起眼的武州山，因为有了“窟”而成为灵山；因为那个窟是空的，有类似拓跋祖庙“大石室”的功能，就更神圣。就这样这个空空如焉的大石窟在北魏神气了100多年，谁也不敢碰它，只敢在窟外建寺，而且建成一座高达山巅、面阔11间的“灵岩寺”；就是云冈在满山遍野的造像高潮时，这里也不敢作任何造像之举。你现在看到的三身大像是后来的事了，有说是初唐造的，有说隋炀帝造的，也有说是北魏正光年间（520年）造的，反正距离其开窟已很久很久了。郦道元看云冈时这里已经有了灵岩大寺，所以才启发出他那一句“山堂水殿”的妙语。而马国柱来这里时，灵岩寺已经烧了，塌了。第3窟的庐山真面目露出来了，和现在看到的差不多。但他看懂了这是法果从西方搬来的佛教第一

山。所以他的那块匾是为第3窟写的。至于后来挂在第7窟，那纯粹是为给康熙皇帝的御书匾作陪衬而搬过去的，没什么道理。马国柱写匾时，佟养量还没有重修第5、6、7、8窟的窟前建筑呢，更比康熙写匾（1696年）早50年，这就不必细究了。

我们赞赏马国柱点破了云冈开窟第一谜。

二、谁使佛教遭“法难”

选择宗教，太武帝犹豫徘徊。

不识时务，佛教徒自取灭亡。

法果和尚一出台就搞成一处灵山圣地，又突破佛门的固执，能带头向皇帝礼拜，还喊出“皇帝即当今如来”。于是赢得北魏两代皇帝信任，生前得到无比殊荣，死后还受封了个“老寿将军”的头衔。佛教的势头很好。

明元帝频频来武州山祈祷神灵，而后索性把武州山定为“常祀”之山，规格如祭天。

第三代太武帝，开始也信佛。还常和高僧沙门谈论佛经，也建过塔，立过寺，抄过经卷，造过金像，还举办过四月八日的游佛散花，在征战扩地时很留意“虏获”高僧，把惠始、玄高、师贤等名僧聚集到京师。佛教的形势一派大好。特别是佛教的“寺院经济”也在太武帝的怂恿下勃然兴起。

但是这个太武帝毕竟又不同于他的祖辈、父辈，他不仅剽悍勇猛、雄才大略，而且头脑相当清醒。当他占领了大半

个中国后并没有踌躇满志，而是冷静地思考着一个问题：我们鲜卑人到底有没有资格统治中国？我们究竟是黄帝的子孙，还是夷虏荒民？其实他的潜意识中民族自卑感极强，所以他急于寻求一种能属于他们鲜卑人的文化，去与汉族文化抗衡。开始他是寄希望于佛教，若能把佛教融入鲜卑民族，就可与汉文化处于对峙之势。可是此刻的佛教僧侣们却不理会太武帝的心情，只顾在优越的条件下侈谈出世、成佛，并依托其经济实力走向腐败。太武帝失望了。

正当困惑中，嵩山道士寇谦之来了。

寇谦之，是一位有学识的道士。为推进道教的发展来北魏寻求政权支持。他看透了太武帝的心思，就编撰了一部道教的“天书”，说太武帝是奉天承运而临世的“太平真君”。其实这是套用儒家的思想以作为道教的理论，用的是“君权神授”的观念。把这个头衔套到鲜卑人头上，立即解除了太武帝的困惑。太武帝满意了。一高兴连年号也改为“太平真君”（440—450年）。

寇谦之就凭“道教儒化”的办法，在北魏开创了新天师道，为道教创下一块里程碑。并在京城东郭兴建了大道坛庙曰“净轮天宫”，与武州山大石窟要一争高下。尤为重要的是寇谦之得到北魏三朝权臣崔浩的支持。崔浩是汉儒，反对佛教。此刻道教与佛教势均力敌地对立了。

太平真君六年（445年），卢水胡盖吴，造反于杏城（陕西中部）。太武帝御驾亲征，驻军长安。偶然在长安一佛寺内发现：藏有大量弓矢矛盾等武器，还有酿酒作坊、妇女密室……太武帝大怒。以此为契机，下令“灭佛”。

这就是佛教史上所谓“三武一宗”大法难之第一件，也是最沉重的一次。尽管在灭佛实施中有“监国”太子拓跋晃的极力保护，放走了名僧师贤、昙曜等，但全国的土木宫塔、佛像经卷、法服器物等“莫不毕毁矣”。佛教几乎在中国北方彻底消失。

“法难”的硝烟中，只剩下武州山的那个石窟巍然屹立。也许因为它是个“石窟”，难毁；也许因为它是个“空洞”，无需毁；也许因为鲜卑人崇拜“大石室”，不敢毁。就这样幸运地给佛教留下一点火种。

事物往往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，好像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。太武帝灭佛7年后，他的孙子文成帝则搞出了大“复佛”，其势头之猛完全可以与“灭佛”相匹敌。

背景是太武灭佛的7年中，北魏王朝灾难迭出：崔浩被诛了九族；太子晃不明不白地死了；太武“感致疴疾”可以说疯了；宫廷发生了政变，北魏王朝一片血腥。

寇谦之也病死了，道教后继无人。净轮天宫没等建成就塌了（今仍有遗迹在御河东岸无忧坡上）。道教处于劣势。

佛教的机会来了。

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，秉承了他父亲太子晃的崇佛遗愿，背弃了他祖父的灭佛措施，而兴复佛教了。其实他们三代人办得是一件事，就是给鲜卑人选择一种宗教文化去弥补其民族自卑的心态。文成帝终于选定佛教。他似乎比他的祖父更高明，他明目张胆地要自己成佛了。佛教徒们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在灭佛的7年间，流亡的佛教徒们在反思。他们从道教